林白与苏童小说文本女性意识差异性研究*

——林白小说系列研究之一

农莉芳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 林白和苏童的小说文本都关注女性意识,但因作家创作视域的差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两位作家所表达的女性意识有所不同。林白站在女性视域中审视女性,并怀着解构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愿望去书写女性,因此她笔下的女性悲剧,主要归咎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而苏童则站在男性视域中审视女性,并带着本能的男权意识去书写女性,因此他笔下的女性悲剧,既源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更源于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对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差异性研究,对促进两性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 林白;苏童;女性意识差异;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7)03-0033-05

林白和苏童无疑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成绩斐然的两朵奇葩,他们的小说文本都关注女性意识,都书写女性悲剧,但由于两位作家创作视域不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两位作家对女性悲剧原因的解读有较大差异,所表达的女性意识存在较大差别。对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差异性研究,对促进两性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

一、林白与苏童小说文本的共性

林白与苏童在小说文本中都关注女性并书写女性悲剧命运。他们笔下的女性大多依附男人而生存,最终都逃脱不了被男权社会掌控的悲剧命运。

林白笔下的悲剧女性,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按男权社会价值标准努力跻身社会却惨遭失败的女人,如《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

《守望空心岁月》中的姚笠等;二是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疲于奔命、最终崩溃的女人,如《说吧,房间》中的老黑等;三是出卖色相换取生存的女人,如《说吧,房间》中的南红、《致命的飞翔》中的北诺、《猫的激情岁月》中的“猫”等;四是逃避男权社会走向自恋和同性恋的女人,如《瓶中之水》中的意萍和二帕、《守望空心岁月》中的艾影等。

苏童笔下的悲剧女性,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旧式封建家庭中争宠的女人,如《妻妾成群》中陈老爷的四房太太,在“争宠—受宠—失宠”的命运轮回中受尽煎熬,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二是邪恶变态的女人,如《妇女生活》中的嫫、芝、萧,一家三代女人,为了拴住男人处心积虑,邪恶变态;三是颓废堕落的女人,如《红粉》中的秋仪、小萼等妓女,抗拒改造,好逸恶劳,恶习难改,等等。小说中的女人们矛盾重重,相互争斗,自相残杀,最终都走向了悲剧。

在小说中,林白与苏童给读者展现的都是活

[收稿日期] 2017-01-12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厅2016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卓越文秘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2016JGA257)

[作者简介] 农莉芳(1967—),女,广西宾阳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写作学理论与教学研究。

[引用格式] 农莉芳.林白与苏童小说文本女性意识差异性研究:林白小说系列研究之一[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3):33-37.

生生的充满悲剧色彩的女性群体形象。

二、林白与苏童女性意识的差异

同样是书写女性的悲剧命运,但林白和苏童所表达的女性意识却有不同,其主要差别在于两者对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解读上:林白笔下的女性悲剧主要归咎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而苏童笔下的女性悲剧则主要是女人的性格弱点所致。我们试对两位作家的女性悲剧作进一步分析。

林白笔下的女性因受男权社会的压制而被迫依附男人而生存,但面对艰难的处境,女人们尚能相互关爱与扶持,甚至在男人缺失的情况下,以同性恋的方式表达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因此,读者对这些女性更多的是表示同情。

《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因父亲早逝,五六岁便经常独居,因而养成孤僻的性格。生存的压力迫使她按照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去努力,结果却处处碰壁。为了缓解生活的孤独和恐惧,她将自己卑贱地献给了男人;她的初夜在江轮上给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年近三十又毫无尊严地去追求一个平庸、自私的男人N,但无论是多米的言听计从还是怀孕堕胎,最终仍留不住N;为了从心灵上彻底逃避N,她嫁给了一个愿意收留她的老男人。多米的事业同样遭受到挫折,尽管她非常努力,但一次偶然的“抄袭事件”导致她前功尽弃……一切竟是那么的艰难!她极力想融入这个社会,但却一次次被无情地抛弃。绝望的多米选择了逃离,从轰轰烈烈的男权社会之战转入了“一个人的战争”,陪伴她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和更加孤独的日子。

《守望空心岁月》中的姚笠既不浪漫也不贤惠,在男人看来,这样的女人既不能做情人也不能做老婆。因此,她的婚姻寿命仅一周之长,后来与情人的感情也很快夭折,婚姻与情感的挫折使她对男人彻底绝望。没有了男人的庇护,她的生存面临更大的危机,为了挣钱糊口,她甚至替一个偷税漏税的暴发户写传记,但尚未完稿,那个所谓的企业家因东窗事发被抓,姚笠的赚钱梦随之破灭,她的日子似乎只剩下了空心岁月。

《说吧,房间》的老黑有职业有家庭,但同样也逃脱不了作为女人的悲剧命运。作为职场女性和家庭主妇,她承受的是双重压力:在职场,她与大多数职业女性一样,与男性面临同样的竞争,承担

同样的责任;在家庭,她必须按传统贤妻良母的标准相夫教子,在没完没了的家务活中穿行。她每天在职场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时间和精力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1]22}。疲惫不堪的老黑连性欲都没有了,最终导致家庭破裂,但更致命的打击却接踵而至:她被单位莫名其妙地解聘了!为了生存,老黑只得撒下幼小的女儿闯荡深圳,只因身为女人,她几次求职均以失败告终,走投无路之际又得知女儿扣扣病重……生存的危机和恐惧时刻噬咬着老黑。

《说吧,房间》中,南红“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1]22}。南红在男人世界中“混”得如鱼得水,她周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从男人那里获取生存的资本,但男人们玩腻了她,便将她无情地抛弃,于是她便从一个男人依附到另一个男人身上,落得身患妇科病,最后死于宫外孕大出血。

北诺(《致命的飞翔》)与单位那个秃头男人一次次上床,仅为换取一张调动工作的表格,但当意识到这只是个骗局时,愤怒的她将那个男人杀了,同时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猫”(《猫的激情岁月》)为了挚爱好友免遭下岗厄运,主动去陪车间主任睡觉,但性无能的车间主任却怪她不够性感,被惹怒了的“猫”杀了那个傲慢的男人,也埋葬了自己的一生。

在男权社会中无处安身的女人们,被迫躲进了女人自己的世界独自疗伤,相互慰藉。《瓶中之水》中的意萍和二帕,像男女恋人那样脉脉含情,彼此爱恋,彼此慰藉;《守望空心岁月》中的艾影,只有通过抚摸和观赏自己的身子才能产生性欲……女人们从自己或其他女人身上得到了“性”的满足。

与林白相比,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之间,传统的姐妹情谊几乎丧失殆尽,她们之间没有关爱与同情,只有勾心斗角,相互猜疑,相互倾轧,直至你死我活。面对这些女性,读者的感觉正如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妻妾成群》中,陈老爷的四房太太为了争宠,手段各异,相互倾轧。二姨太卓云表面贤良慈善,实则蛇蝎心肠,为了打压三姨太,不择手段给三姨太投堕胎药,表面对四姨太客气和善,背地里却咒她早死,四个女人斗她心机最重,手段最毒。三姨太梅珊泼辣耿直,但心计手段却不是二姨太对手,

后因失宠而红杏出墙,注定了她死亡的命运。四姨太颂莲,是个大学生,知书达理,却自愿嫁给陈老爷为妾,并使出浑身解数以博取陈老爷宠爱,但她假怀孕的闹剧导致失宠,最后成了疯子。女人们争斗的结局只有两败俱伤。

《妇女生活》中,娴、芝、萧之间的家庭关系很简单:娴是芝的生母,芝是萧的养母,但内心的精神关系却很复杂,三代女人的精神追求透视出中国女性无法摆脱依附男人而生存的悲剧命运。娴年轻时幻想着依靠某电影公司孟老板实现明星梦,但娴意外怀孕并拒绝人流,导致其梦想化为乌有。娴表面上是怕痛而拒绝人流,但实际上内心或许抱有不可言说的幻想:生下孩子拴住孟老板。但随着孟老板的绝情离去,靠山轰然倒下,拒绝人流成了娴一生痛苦的源头,以至于她将日后种种不幸都归咎于此。芝作为私生女,一直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中,母亲总认为是芝的出生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因此嫌弃她,稍不如意就迁怒于她。芝从小就感受不到家的温暖,父母爱的缺席导致她缺乏安全感,加上无法生育,更感绝望,无依无靠的恐惧使她对丈夫邹杰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并演变成近乎变态的占有欲和控制欲,最后逼得丈夫卧轨自杀,也把自己逼成了疯子。萧是芝的养女,但并非芝愿意收养的孩子,芝不愿意养女孩,因为她对女性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母亲和自己的命运如此悲惨,归根到底就是生为女儿身所致。但邹杰从福利院抱回的却是女孩,因为那里没有男弃婴。因此,从萧被抱进家门那天起,芝就没爱过她,姥姥娴也只当养了只“波斯猫”,唯一对她有爱的养父,却在这份“爱”中掺杂着难以启齿的情愫——性亦或是情欲。萧厌恶这个畸形的家庭,恨家里的每个人。为了逃离家庭,她16岁便主动到苏北农场插队,但两年后艰难的农场生活又逼得她不得不以病退为由回城,后来为了结婚用房而将养母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萧怀孕期间丈夫出轨,但丈夫对她的指责毫无悔意,甚至羞辱她:“我再下流也没跟自己的养父睡觉……你有什么资格来干涉我的自由?”^{[2]106} 无辜的萧绝望至极,想杀死丈夫却下不了手,丈夫对她说:“我知道你下不了手,所以我一点也不害怕……你怎么打得过我呢?一般来说,女人都敌不过男人。”^{[2]110} 萧嘴上虽说:“我不会轻易地放过你。”^{[2]110} 但最终也只能无奈地离婚,成了弃妇。三个女人经历虽有不同,但她们依附男人而生存的性格弱点是一样的,因而注定了悲剧结局。

《红粉》中的秋仪与小萼曾是一对好姐妹,但因小萼抢了秋仪的男人浦,姐妹俩成了仇人。秋仪和小萼都认为,女人只有依靠男人才能活着,因此,对于老浦,秋仪既是真爱,也是生存的依附,而小萼则纯粹为了生存依靠。秋仪曾想依靠自己生活,但社会的偏见却让她无处安身。因为曾为妓女,她姑妈希望她永远待在尼姑庵,省得街坊邻居说闲话;当她回家奔丧安葬完父亲,再次回到玩月庵时,老尼姑却说不能再收留她了,因为她玷污了佛门。走投无路的秋仪又回到家中,但住着她房子的姑妈和表弟却不待见她,表弟甚至将她的照片从全家福上抠下来扔进垃圾堆里,还责怪她回来占了自己的婚房……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寻找新的依靠,而出路只有嫁人,她说:“只要是个男的,只要他愿意娶我,不管是阿猫阿狗,我都嫁。”^{[2]70} 于是,她嫁给了鸡胸驼背的丑男人冯老五,也许在她的潜意识里,这个丑陋的男人反而给了自己依靠的安全感。小萼生下儿子不久,老浦因贪污公款而被判死刑,做了一年寡妇的小萼无力支撑生活,又跟随另一个男人去了北方……

苏童借女人之间的争斗,将女性的悲剧境遇和悲剧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季红真说过:“被男人所宠爱的女人,自然要被女人嫉恨,而得不到男人爱的女人,也自然得不到女人的尊重。女人受到男人攻击时,最高兴的莫过于其他女人;女人攻击女人时,通常引用男人的话,既含蓄又婉转。”^[3] 此话一针见血道出了女人的性格弱点及其悲剧的主要原因。

三、林白与苏童女性意识差异性的原因分析

林白与苏童小说女性意识的差异,与作家叙事姿态和叙述角度的差异有关,更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有关。

(一)作家叙事姿态和角度的差异

林白以参与者的姿态出现在作品的女性群体中,她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如《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身上就有作家的影子,多米的成长经历与作家的成长经历极其相似。这种融入女性生命体验的叙事姿态,所产生的作用不只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叙述作用,而且加速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精神上的沟通,因此也最容易打动读者,使读者感同身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在叙事角度上,林白将人物的矛盾对立建构在女性与男性之

间,并从女性视域去理解女人,她怀着解构男权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压迫的愿望去理解和叙述女人。林白曾说过:“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和淹没……通过个人化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4]因此,她小说中对女性的刻画,更能表达出现实女性的深层意识,包括女性的反叛意识和隐秘的生命意识。因此,对于女性意识的表达,林白比苏童更为细腻与深刻,更能表达一种不可言说的女性生命深处的疼痛,使人对深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人们表示深切的同情。

而苏童则以旁观者的姿态冷静地观察和叙述作品中的女性群体,他说过:“在小说中……我在表现女性的时候尽量让她们真实化,我从来不会去把她们无休止地美化,她们是什么样的我就写什么。”^[5]这种客观的叙事,使读者对这一矛盾重重、相互排斥的女性群体产生一种冷酷的悲哀。此外,苏童将人物的矛盾对立建构在女性之间,而男性作为始作俑者却被排除在矛盾焦点之外。并且,作为男性作家,他是站在男性话语权视域中去理解女性,将男性意识强加在女性身上,有些甚至只是作家单方面对女性心理的臆想,而非女性真实的想法。因此,小说叙述中虽没有明显掺杂作家个人的情感倾向,但读者能从中读出其男性话语权的意识:这个社会,仍然只能是男人的社会,男人才是主宰世界的主人,而女人只能处于被主宰的地位,将永远摆脱不了依附的命运。因此,他作品中的女人都是心甘情愿依附于男人而生存,为男人而勾心斗角,相互倾轧……

(二)作家女性意识差异性的文化根源

林白与苏童在女性意识表达上的差异,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作家思想中的积淀不无关系。

“三从四德”是儒家礼教对中国妇女道德的规范要求,“男尊女卑”思想亦由此产生。几千年来这种封建思想影响着世代中国人,并根深蒂固地渗透到国人意识中,乃至进入集体无意识状态,人们本能地将“三从四德”视为女性道德标准,男性主宰社会话语权,而女性则本能地接受被主宰的命运,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女人”与“人”不能相提并论。孔子就曾否认“女人”是“人”,据《论语·泰伯》记载:“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有妇人焉,九人而已。’”^[6]武王说:“我有十位

能治理天下的贤臣。”孔子却说:“武王的能臣中有一位妇人,因此实际上只有九位能臣而已。”可见孔子并未将“女人”归入“人”之列。

以反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思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驱者们崇尚民主与科学精神,将“三从四德”等封建观念视为“奴隶之道德”加以抨击,在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潮中,女性解放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冯沅君、庐隐、丁玲等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武器,为女性争取作为“人”应有的地位与权利,鼓励女性“去过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做人”^[7]。然而,女性解放的新思想与封建旧观念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在这场博弈中,本来就势单力薄的抗争者们最终抵不过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未能将女性解放出来。新中国成立后,依靠政府行为,女性拥有了与男性同工同酬的所谓“平等”地位,但这种完全不顾及女性生理与心理特质的“平等”又导致女性解放陷入了极端,造成了女性性别角色的失衡。这种失衡随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所倡导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而有所好转,在社会普遍追求人生价值的同时,女性更注重追求作为女人的价值,甚至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追求与别人不一样的个人价值,她们专注于个人欲望,而对于男人的缺席则无所谓。

但事实上,女性关于女性价值表现的愿望,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女性价值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作家的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林白的作品中,从表面上看,女人们在女性精神家园中找到了新的情感依托,似乎可以不依靠男人也能得到慰藉,但无论是自恋还是同性恋,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多米最终逃离了南丹的追求,因为她的潜意识里隐藏着传统婚恋观,认为异性恋才是正常的,而同性恋则是变态的,最后不得不嫁给了一个老男人;艾影虽然依靠抚摸和观赏自己的身子才有性欲,但却要依靠男人的疯狂占有后才能达到满足;二帕在与意萍的同性恋中,也始终觉得那是一种病态的感情,而正常的应该是异性恋。因此,小说中的女性虽以自恋或同性恋的方式表达了对男权社会的抗拒,但她们失败的结局也表明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女性的抗争是多么的无力,最终只能妥协。从作品中女人们近乎宿命的悲剧结局来看,作家解构男权社会的愿望似乎很难实现。

直至21世纪,虽说女性在许多行业各领风骚,但她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女人仍在社会夹缝中生存,社会话语权仍掌握在男性手中,两性博

弈依然存在。正如陈晓明说的：“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像中国的妇女这样解放，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像中国的妇女这样不解放……说到底，中国妇女并没有真正解放，妇女解放不过表现在外在的社会组织形式方面，而没有落实在女性意识的深处。”^[8]

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客观现实，男性作家很本能地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将女性刻画成绝对顺从、心甘情愿听命于男性的奴性形象；而女性作家出于对男权文化的反抗，很自然地便将女性塑造成努力摆脱男权控制的反叛、独立的女性形象，林白与苏童小说的女性形象便是如此。

四、林白与苏童小说的女性意识 差异性研究的现实与文化意义

作品就像一面镜子，它能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感受与愿望，“作者通过创作文学作品以表达他的感受，并试图以此唤起读者相应的感受”^[9]。因此，林白与苏童小说女性意识的差异，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正是导致男女性别矛盾的主要原因。通过对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探究，我们能借一斑以窥全豹，解读由来已久的两性话语权之争的原因症结，这对促进两性和解、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

性别的博弈由来已久，两性作家关于女性意识的创作现实也表明这场博弈还将继续。如果单靠女性的奔走呼号，是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

性解放与社会和谐的，只有整个社会从话语权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中觉醒过来，理性看待女性之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客观差别，重新认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才有可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和谐，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的。就像弗吉尼亚·沃尔夫说的：“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10]这或许是人类最理想的期待。

[参考文献]

- [1] 林白. 说吧, 房间[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 [2] 苏童. 苏童作品[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 [3] 季红真. 世纪性别[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7: 104.
- [4] 林白. 林白文集[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303.
- [5] 林舟. 生命的摆渡: 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8: 79.
- [6] 陈戌国点校. 四书五经[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1: 32.
- [7] 肖凤, 孙可. 庐隐选集[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445.
- [8] 陈晓明. 边缘之路: 穿越“巨型寓言”的女性写作[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5: 1.
- [9]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9.
- [10] 弗吉尼亚·伍尔. 一间自己的屋子[M]. 吴晓雷,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120.

On the Differences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between Lin Bai's and Su Tong's Novel Discourses

NONG Lif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 Lin Bai's and Su Tong's novels both pay much attention to female consciousness, but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re expressed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writing view and differ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s. Lin B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describes women with the wish to deconstruct patriarchal society's oppression on women, to which the tragedies in her novels are mainly attributed. Su T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n, delineates women with instinctive patriarchal consciousness, so the tragedies in his novels are attributed to the patriarchal society's oppression on women as well as women's personal weaknesses. Th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between these two writers has positively pract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n the promotion of harmon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Lin Bai; Su Tong; differences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cultur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易奇志]